

• 历史学研究 •

中东 19 世纪的经济改革与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王三义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中东改革者追求的总体目标是富国强兵, 从改革的结果看, 无论埃及的改革还是奥斯曼政府的改革都没有达到总目标, “图强”的美好愿望遇到挫折。但是, 经济领域改革的许多具体措施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 改革的一些“小成就”甚至对中东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成就与挫折, 19 世纪的经济改革是中东现代化的开端。改革出现“大挫折”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造成的, 客观因素包括自然条件限制、劳动力不足、资金和技术欠缺及政治、宗教因素的阻力等; 主观因素包括改革者认识上的局限等。

关键词: 中东; 经济改革; 早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8)05-0051-05

国内研究 19 世纪中东经济的专题论文较少, 中东通史和国别史以及各类研究现代化的书籍只是笼统地讨论埃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改革。其实, 是纯粹的军事改革, 后来改革者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强大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 便转向经济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改革并不顺利的时候, 又认识到制度的变革同样重要, 于是出台了一些政治改革措施。所以, 经济改革是核心也是关键, 而现有研究和对中东经济改革的评价着眼点主要是改革的性质问题(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因而结论都是“改革虽起到了进步作用, 但最后都失败了”, 这样的结论看似有理, 实际上并不妥当。因为中东近代的改革有“失”但未必全“败”。关于中东经济领域的改革, 有几个实质性的问题需要探讨: 其一, 哪些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成就? 哪些方面的改革事与愿违, 甚至带来负面影响? 其二, 改革的长远影响有什么? 经济领域的改革能不能算是中东现代化的开端? 其三, 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只有弄清这些问题, 才能对中东近代的经济改革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一 埃及和奥斯曼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结果

中东近代的西化改革, 比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的西化改革都早(被誉为“开风气之先”)。早在 1718 年, 奥斯曼帝国伊卜拉欣帕夏呈递给素丹的一

份奏折中就指出赶上西方军事水平的必要性, 建议实行改革(有的学者把 1718 年看作“西化”的起始年代)^[1]。奥斯曼帝国真正的改革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1792-1807), 然而其改革只限于军事领域。波斯在阿密尔·卡比尔任首相时期(1848-1851)和米尔扎时期(1870-1880)先后进行过经济和军事改革, 但收效不大。19 世纪中东经济领域有影响有成效的改革, 一是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的改革, 二是奥斯曼帝国¹马哈茂德二世经济领域的改革(自 1831 年始)和“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富国强兵、赶上西方。改革的内容: 其一, 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措施包括废除旧的土地制度、把没收的土地重新分配; 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作物种植(尤其鼓励种植棉花); 其二, 建立现代工业。大力兴办军事工业、纺织工业、制糖工业以及其他民用工业。其三, 财政和税收改革。整顿财政, 取消包税制, 重新确立土地税额、简化征税手续。其四, 发展交通, 促进对外贸易等。阿里推行改革的手段是实行国家垄断。其中, 农业方面主要是政府掌握土地使用权、对作物种植和生产进行监督, 并控制农产品销售环节。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控制工厂的建立、技术人员的聘用、工厂的生产和管理等。

收稿日期: 2008-03-16

作者简介: 王三义(1968-), 男, 甘肃清水人,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世界近现代史、中东史。

¹ 从名义上说, 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奥斯曼帝国包括埃及。事实上, 埃及是独立的, 埃及的统治者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和司法大权。所以本文严格区分埃及的改革和奥斯曼政府的改革。

奥斯曼政府经济改革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马哈茂德二世改革,后一阶段是“坦齐马特”改革。马哈茂德二世经济改革的内容有:设立财政部、农业部、外贸部等机构;实行税收改革,废除包税制,开展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派专人征收直接税;鼓励发展农业;从国外进口新机器,招收技术人员,建立现代工厂。“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则是从财政问题着手,1840年建立了第一家欧式银行(此后又有几家银行建立),并建立了财政预算制度;颁布了商业法、新土地法等;进一步废除包税制,使直接税的征收方式在全帝国推广,同时减税,合并部分税项;建立现代工厂(政府先后投资建立了150多个工厂)。此外,还鼓励发展农业,措施主要是培训和建立农业技术队伍,派技术人员指导和检查农业生产,设立农业学校,成立农会等。

直观地看,埃及和奥斯曼的经济改革都没有尽快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不但没有在短期内增强国力,赶上欧洲国家,而且由于改革触及传统势力的利益,下层民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改观,从而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正因如此,关于中东19世纪的改革,反映在教科书和各类通史中的评价一般是“改革最后失败了”。其实,研究中东近代经济问题的学者如查尔斯·伊萨维、罗杰·欧文、艾哈迈德·希塔等,已经充分肯定了中东经济改革的成果,并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惜这些观点还未被介绍到国内,没有被中国学者撰写的通史和教科书所吸收。中东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实现总体目标,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用,有些甚至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宏观上看,阿里的经济改革阻止了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维护了埃及经济和政治的独立。阿里大量进口西方机器,聘请欧洲技师,但他并未一味依赖外国,他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也在国内仿制,一旦试制成功,便减少进口。阿里选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学成回国后逐步替代欧洲技师。同时尽力保护国内市场,开辟国际市场,西方资本的渗透受到限制,民族工业迅速发展^[2]。

再看奥斯曼政府经济改革的成果,如果考虑到当时帝国内外交困的严峻情形,那么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成就是突出的。马哈茂德剥夺了那些军队、财政和司法独立的贝伊和帕夏的权力,重申素丹对全国的统治,使帝国首次走上了建立现代统一国家的道路。他完善了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倡导信仰自由,发展商贸,为后来的改革播下了种子。改革中

最重要的是废除封建制度,没收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随着封建主阶级的削弱和完全依赖国库的放债人数量的减少,重振帝国道路上的深层障碍被拆除^{[3]10-11}。到1839年马哈茂德辞世时,帝国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坦齐马特”改革成功的方面主要是农业改革和税收改革。“坦齐马特”时期,国家控制了主要的财政收入,除了农业税外,给政府带来较大财政收入的还有关税,对政府控制的企业所征收的税和印花税。关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资源税(征之于当地产销的货物如鱼、烟草等)、通行税(帝国境内装载的外国货)。原先由包税人征收的盐税,到坦齐马特时期,征税权收归国家,政府控制了盐的所有权、生产权、销售权,盐税收入直接交入国库。另外,还有军火制造和出售、邮政和电报服务,也是政府垄断,收入尽归国库。印花税为坦齐马特时期“首创”,实际上为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后的10年间,上述各项税收收入是增加了^{[4]104-105}。

考察整个19世纪中后期的中东经济史就会发现,奥斯曼政府经济领域改革的成效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在改革之后的年代里显现出来的。19世纪晚期阿卜杜·哈米德统治帝国的几十年间,农业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坦齐马特”时代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如农业技术推广的成就、农业贷款等^{[4]232}。“坦齐马特”时代谷物生产受到鼓励,亚美尼亚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受到青睐,安纳托利亚的种植者直接在伊斯坦布尔开拓市场,取代了依赖巴尔干粮食的局面。当时葡萄生产也受鼓励,不仅提供酿酒原料,而且是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一度占帝国全部出口额的20%。此外,19世纪棉花生产也有较大发展,虽然优质美国棉的竞争曾使奥斯曼的棉花产量一度下降,但政府鼓励棉花生产,免费配给美国棉种籽,结果,奥斯曼棉花在世界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定份额。1900年以后棉产量大增,在阿卜杜·哈米德统治时期,棉花出口增长到出口额的25%^{[4]232}。所以,前期的农业改革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奥斯曼政府的工业建设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完善的艰难历程,至少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这为后来土耳其的崛起准备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二 经济改革的深层影响及中东现代化的启动

在19世纪中东经济领域的改革中,穆罕默德·阿里认识到管理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因此

进行了全面改革。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改革者们,在经济改革遇到阻碍时才意识到政治法律制度和观念改变的重要性,转而实行相关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落后国家以“图强御侮”为目的的改革经历是相似的,中国学者对此并不陌生。把中东 19 世纪的改革称之为“西化改革”是合适的,因为当时的改革有别于 20 世纪初期土耳其、埃及、伊朗等国的现代化改革。问题在于,中东 19 世纪的改革能不能算是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或起步? 尽管相关著作和论文已经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笼统地当作中东现代化的起点,但还有仔细分析的必要。如果 19 世纪的改革是中东现代化的起步,这就涉及到作为“起步”的改革中,哪些领域的改革起到关键的或是核心的作用。笔者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建设可以算作中东现代化启动的标志。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不但削弱了经济改革的成效,也阻碍了现代化因素的成长,但经济领域一些具体的改革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客观上为后来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甚至后来有些现代化改革就是 19 世纪经济改革的延续和拓展。因此,首先要分析中东经济改革的深层影响,即分析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

对阿里的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不论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后世的评论家,历来是批评者尖锐抨击,赞许者极力赞扬。关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误或负面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 其次,国家垄断了农产品,降低了农民对作物的关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生活处境未能改变; 再次,改革的目的固然有发展生产、维护民族独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外扩张,建立地区霸权,阿里时代穷兵黩武,兵连祸结; 最后,所建的工厂管理不善,生产混乱。但穆罕默德·阿里实行的土地政策与农业垄断,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应该看到农民的确从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他们经官方登记后分得土地,从土地上得到收获,并确切知道该缴纳哪些税。在阿里当政之初,埃及仅有一小撮马穆路克(军事封建主)和穆尔塔齐姆(包税人)占有土地,农民只是他们的奴隶。在埃及当时的条件下,把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是困难的,实行彻底的私有化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在赛义德帕夏统治时才有成果,那是因为已经准备了足以从旧的土地关系向新的土地关系过渡的条件。垄断政策的实行分明是推行新政的需要,假如允许农民耕种私有土地,自由出售农产品,埃及农民当时未必能买得起必需的牲畜、农具,也不

能种植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阿里时代是“真正追求独立和进步的意识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代”,“同时也是赶上系列战争的时代,所以极需国家监督各个生产部门,特别是对农业的监督和农产品的垄断,阿里的措施动员了国家一切资源为独立和繁荣而斗争”^[5]。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6]。除了各项具体改革措施取得的成就外,“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6]。

乔治·柯克认为,对于一种不发达的农业经济,强迫实行官僚政治的集体化制度以加速实现工业化非常困难,而把一种崭新的工业生产制度强加于原始农业和行会经济之上,必然要遇到障碍。阿里即位时,埃及处于衰竭状态,“值得惊异的并不是他所实行的物质方面的改组计划失败了,而倒是他竟然能够尝试那个在五十年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事: 将埃及从许多世纪为虐政所窒息的泥淖中拯救出来”^[7]。阿尔伯特·胡拉尼指出: 我们不应低估奥斯曼改革的成就。如果对比 1870 年与 1820 年的奥斯曼帝国,无疑会发现 50 年的变化是多么大: 非穆斯林是自由的; 行省连遥远的汉志都在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之下; 行省管理得到改革; 耕地面积有了增长; 奥斯曼“国家地位”的观念开始传播; 生活方式的改变明显。^[8]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奥斯曼社区以缓慢的半不情愿的方式逐渐融入现代世界。“坦齐马特”改革,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安全,确保赋税的定期征收和所有国税的分配^{[3][13]}。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以西方模式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 and 实践从此开始。

为巩固经济改革成果也相应进行了制度建设。19 世纪政体改革的目标就是使奥斯曼帝国从传统的东方专制国家转化为现代法制国家。土耳其国家财政的现代化和制度转型也是改革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在“古尔汗颁令”的条款中就包括税制改革的指导性原则。颁令向那些对现存税制不满的非穆斯林纳税人许诺,要改变他们承担过多税负的情况。由于包税制被废除,征收直接税成为奥斯曼帝国财政制度的基础^{[3][60]}。1854 年之后奥斯曼政府持续发放贷款,尽管贷款增加产生了许多弊端,但不可否认,资本的引入在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大批社办企业

的建立和租借地的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东方国家欧化的第一阶段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资金流入才成为了可能。

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观念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变革,只有某一方面的变革不可能使整个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和进步,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经济上的工业化为核心,所以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还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从经济角度来说,工业化指的是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部门在重要性方面取代了农业(服务业的地位在工业化早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从制度角度来说,工业化指建立起近代工业制度。面对西方工业化的挑战,中东国家的政治家试图推行改革,争取赶上西方,而工业化的冲击迫使中东社会以弱势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失去了从容筹划发展战略和设计改革方案的机会甚至权利。早期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试图建立现代工业,并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改革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经营、财政税收、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农牧业社会的藩篱,为中东走上现代化道路准备了条件。中东经济领域的改革,启动了中东现代化的进程。

三 经济改革未达目标及现代化起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中东19世纪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逐个分析。

阻碍穆罕默德·阿里实现宏大的工业计划的自然限制具体来看有这样一些:埃及不产煤和铁,从国外进口这两种必需的原料费用很大;没有足够的机械动力,用牲畜牵引作动力的工业生产,其效率可想而知;埃及气候干燥、尘埃多、机器的损耗快;原料质量低劣,生产不出好产品。另外,工业企业管理不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官吏管理工厂,不懂簿记、生产流程、机器性能,只关心物质利益,尤其是自己的利益;集中管理方式没有效率,大部分劳力都忙于农业,再加上军队、公共事业需要大批人力,使工业劳动力缺乏。在上面一种经营管理状况下,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工人的劳动热情不高,破坏机器、怠工现象很普遍。除此之外,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因素。庞大的工业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可埃及物质资源有限,也没有可以向工业投资的民族资本,资金不足影响了工业发展。二是技术因素。起初从英、法、意请来工程师、技术人

员、熟练工人,后来用埃及人取代外国人,结果并不成功。不是埃及人智力不高或不能接受科学,而是埃及人缺少“现代的技术修养”,而这种修养不能在短期内产生。三是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限制。阿里发展工业是因军事需要,而外交上的挫折实际上毁灭了他的希望。埃及的工业品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欧洲货竞争,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又遭到英国反对,埃及的垄断制度遭到破坏。

奥斯曼帝国改革只是消除了奥斯曼政治管理中的一些腐败因素,没能改变社会结构。从塞利姆三世改革到“坦齐马特”改革,奥斯曼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颁布世俗法令、保证个人财产权利、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设立世俗法庭,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等。但是,这些措施在从计划、采纳到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情况,甚至出现矛盾,颁布和实行中困难重重。政策的实行受多方制约,由于民族成分和教派复杂,改革既要平衡各种力量、正视各派的反映,还要考虑欧洲人的态度^[9],阻碍因素极多。奥斯曼帝国地域广阔,交通运输落后,各地联系不紧密,人们生活在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部落、乡村、城市里,因信仰、种族、语言的差异,分为不同的生存群体或集团。例如,税收改革在农村推广的成效不大,不是因为地籍调查困难,而是政府派不出充足的胜任征收直接税的税收官。^[10]按威廉·耶勒的话说,“在基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改变之前,凭着素丹的颁令,要把欧洲的政治制度搬到这个地方,未免过于理想化”^{[11] 40}。

因为中东流行古老的农耕方式、古老的手工业、传统的商业,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中世纪的祖先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又不可能在几年几十年内改变,这表明经济改革的难度。19世纪中东改革中基督教徒普遍接受变革思想,甚至采取革命运动,但土耳其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对改革持冷漠态度,或者受反动分子煽动,部分人对改革运动中的革新措施表示不满。当然,改革未能成功“根本的因素是自由制度没有基础,中东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的变革,产生出一个现代工薪阶层,或强大的中产阶层。只要农民、非工业化的城市工人仍然贫困,仍然受到压迫和奴役,自由制度不可能实现”^{[11] 43}。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尤其是欧洲列强的经济控制,中东被强行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中,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例如,英国在中东的政策自相矛盾,为了对付俄国,为了保证英国与印度商路畅通,它努力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但是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又设法使奥

斯曼对英国商品产生依赖^[12]。

从根本上看,埃及和奥斯曼政府的改革都带有很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不纯粹以发展经济为目的,而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片面强调达到一种目的,往往顾此失彼,引起连锁反应。再者,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是从上层,主要是素丹和一些已觉悟的统治阶层成员开始的,不像西欧的政治变革是经济发展后有产阶级强烈的掌权要求引发的。另外,在中东引入帝国的新方法和新制度都是外源的,有些内容根本不适应中东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很显然,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是不能用突然的方式使它接受现代工业社会制度的^{[11]32-33};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短期内可能用强制手段强加于一个社会,但要使它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变革和长期的调适。总体来说,作为现代化内动力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 19 世纪中后期,列强在中东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增强,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中东的现代化步履维艰。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M].张增建,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81.

[2]杨灏城.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J].世界历

史,1980(5):49-58.

[3]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M]. London: New Fetter Lane, 1998.

[4] S. J. Shaw & E. K.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 Vol. ③ [M].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6.

[5][埃及]拉西德·阿里·巴拉维,等.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M].北京:三联出版社,1957:67.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M].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99:241.

[7][英]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M].武汉大学翻译组,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81-82.

[8] Albert Hour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M]. London: St Antony's College, 1981:14-15.

[9] Irvin C. Schick, Ertu ru l.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0.

[10] Erik, J. Z 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 [M]. London: I. B. Tauris & Coltd, 1993:62-63.

[11]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 [M]. Michiq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12]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rm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54-56.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Start of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Sa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goal that reformists had pursued in the Middle East was making country wealthy and strong. As a result, it had not come true in Egypt and the Ottoman Empire, so the good will of making country wealthy was frustrated.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concrete reform measures yielding effect to a different extent even, with some “minor achievements” produc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East history. All these reforms were the st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19th century. The frustration of these reforms were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ny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nature conditions, short of labor force, deficiency of fund and techniques, the boundednes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etc. and subject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gnitive limitatims of reformists.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reform; Early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石 涛)